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再探讨

赵入坤

内容提要 对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目前学术界的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各有片面。本文首先界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美国整体世界战略、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由此,分析论述学术界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尤其是主流观点的片面之处,指出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这一政策实施的时间是1944年春至1946年3月。

关键词 苏美关系 中国政治形势 对华政策

二战结束前后(1944—1946)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到中国现代史学界和中美关系史学界的关注。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不仅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理清了基本史实,也进行了有益的学术争鸣。争鸣的重点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时间。概括起来说,目前的争论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新政策的特征为“促进苏蒋接近和中国国共两党接近”^①;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在抗战时期可以概括为扶蒋容共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可以概括为扶蒋反共”,“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在1944年9月至

① 时殷弘:《开罗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

1945年4月间发生的”。^①后一种观点虽然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不同观点依然时有提出。因此,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本文试对此略述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

对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史实,学术界看法基本一致。目前两种学术观点产生歧义的根源是各自对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立论依据,看法有异。因此,要讲清楚这一问题首先要界定,什么样一些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一般讲,影响一国对另一国外交政策的因素有三:本国的战略目的,地区及世界政治形势,目标国家的国内形势。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指出,“外交政策是达到目的的手段”。^②因此,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是其本国的战略目的。但是,这又并非绝对。国际政治理论学者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在多数情况下“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行为,往往只有在外部世界没有给每个国家以沉重压力的那些和悦时期里,才能以本国历史以及和谐时期里产生的价值来解释”。^③也就是说,由于地区及世界政治形势的影响,一国对外政策与其目的之间存在差距。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是双边关系的反映,也是多边关系的一个缩影。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扩展和维护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是列强竞争的国际场所,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从多边国际关系的角度去考虑,而不仅仅是以中美双边关系为出发点。综观一

① 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② 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③ 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6页。

百多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历史,可以发现这一特点的明显轨迹。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首次独立提出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调整美国与其他列强的在华关系,以保证中国全境对美国商务开放。这一政策自1899年提出以来,直至1941年“一直未曾改变”。^①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并非始终如一。远东国际关系经常对实施这一政策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初,日俄对中国东北的瓜分严重触犯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仅屡屡提出抗议,甚至打算与德国联合,拉上清政府组成三国同盟,以抗衡日俄。但是,远东的国际形势最终使美国与日本妥协。1908年《罗托——高平协定》的签订表明,美国默认了日本在南满的优势地位。“一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并通过皖系军阀操纵中国政局。美国不满于日本独霸中国的状况,支持黎元洪和冯国璋抗衡皖系军阀,导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两次出现“府院之争”。最终,美国还是向日本妥协。1917年美日《蓝辛——石井协定》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一战”后,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在列强间重新确定了“门户开放”政策。未已,日本在“九·一八”后独占东北。美国虽在1932年提出“不承认主义”,但是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七七事变后,美国除了空洞地宣讲“门户开放”政策外,没有对日本侵华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总的来讲,这一时期美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有这样的特点:维护“门户开放”政策以避免卷入战争为前提,倘有卷入战争的可能,它就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国际政治是实力政治。“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实力不足的产物。美国经济实力虽在1894年跃居世界首位,但是其军事实力长期居于其他列强之后。1940年,美国仅有陆军(含航空兵)27万人,海军(含陆战队)19万人,总数不足50万人,另有国民警卫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786页。

队 23 万人。^① 这样的军事实力使得美国经常在国际角逐出现激烈的实力碰撞时退下阵来。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具体情况而笼统地说,“门户开放”就是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实际情况是“门户开放”政策在实施中往往被抛在一边。美国人自己也承认,美国对华政策的效果“并不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或保证商业均等”。^②

太平洋战争使得美国的军事实力膨胀起来。珍珠港事件后,美军不仅在太平洋上独立对日作战,而且派军远征北非和欧洲。由于实力地位的变化,美国对国际政治的兴趣明显增加。1942 年至 1943 年冬,美国人开始注意战后计划。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警察维护国际和平的设想。1943 年 10 月《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罗斯福开始实施其战后大国合作的设想。在罗斯福的设想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国民政府作为唯一能统一中国的政权应得到支持;中国从日本和其他大国手中收回它所有领土。^③ 罗斯福之所以确定这样的对华政策目标,目的在于建立战后中美的密切关系,维护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由于中国国内政治格局和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同样存在种种变数。

二

由于受种种变数的影响,抗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当复杂。

① 军科院军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册,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3 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787 页。

③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1 页。

笼统地讲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扶蒋容共抗日,很不确切。国民政府是当时美国所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扶蒋是美国一贯政策。对此并没有争论的必要,但是容共抗日则不能一概而论。

就支持中国抗日而言,美国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在此之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是纵容日本侵华。七七事变后,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不分是非,要求中日共同承担对世界和平的责任。^①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1937年8月27日提出,美国对中日应采取的政策是“避免卷入”,“保持完全中立”。这一意见得到了国务卿赫尔的支持。^②同年9月5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海岸。美国接受了这一事实。9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告,约束美国商船到中国的航行。^③美国对日纵容最突出地表现在处理对日制裁上。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侵华战争所需的大量物资依靠进口。美英等国是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70%。抗战爆发后,中国多次请求美英实施对日禁运,以削弱日本的战争力量。但是,美国并没有响应。1937年到1939年,美对日出口的各类战略物资价值7.16亿美元,是同期对华出口1.41亿美元的5倍多。1938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各类战略物资占其总进口量的45~91%。^④

1938年11月,日本明确提出以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取代华盛顿会议所建立的旧秩序。由于日本不断侵犯欧美在远东的利益,美国对华政策才逐步由“中立”转变为维持中国抗战,牵制日本的政策。美国首先逐渐限制对日输出。1940年1月《日美通商航

① FR, VOL1, Washington1943, pp27.

② 格鲁:《动乱的时代》第2卷,波士顿1952,第116—117页。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③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第204—205页。

④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第199—200页。

行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其次,在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时,美国发表声明,宣布继续承认重庆政府是合法政府。美国进出口银行也宣布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在日本进占印度支那北部的情况下,美国在1940年9月26日宣布对日贸易禁运。但是,美国此时的对日制裁留有相当大的余地。因为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并未列入禁运范围。而日美外交谈判也在进行。美国希望通过谈判说服日本。正如赫尔所说,美国希望“找到另外一些什么可用来接近他们并说服他们不要骑一匹野马奔跑”。^①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真正停止对日妥协,与中国结盟,支持中国抗战。

容共抗日是蒋介石在1939年以前的政策。在抗日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并没有提出容共抗日的问题。相反,美国官方对中共及其军队很少予以关注。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人员只有一个卡尔森上校访问过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1941年初,正当皖南事变之时,美国总统特使柯里访华。时机的巧合使美国舆论揣测,柯里是否负有调和国共矛盾的使命。实际上,柯里访华出自宋子文的邀请。其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经济币制情形”。^②柯里访华期间,倒是国民党多次主动提及国共问题。柯里也只是口头转达了罗斯福的私人意见。同年秋天,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思在报告中指出:“国共两党关系没有变化,就是说,不能令人满意,但尚无特别关注或立即进行干预的必要”。^③中美结盟后,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重返中国。他也很少注意中国共产党人。他不曾同

① The memories of CORDALL HUI II, VOL1, NEW YORK 1948, ppl12.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第一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 1981年版,第533页。

③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151页。

周恩来或其他共产党人接触,除戴维斯外,也不容许其他下属会晤他们。当多恩建议同共产党人接触时,他警告说:“别让我听到你们在试探”,“我们到这里是同政府站在一起的”。1943年初,周恩来重申邀请美国军事观察员赴华北亲自调查。这一建议未被理会。^①

美国提出容共问题是在1944年。以赫尔利任驻华大使为界,美国容共政策的侧重点前后并不一样。在前期,美国的侧重点在于运用共产党的军队,挽救中国战场危急的军事形势;所以,在中国正面战场形势危急时,才出现了罗斯福给蒋介石的那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在后期,美国的目的在于使国共联合,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避免国民党在可能到来的国共斗争中垮台。美国提出容共政策的史实是清楚的。这里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详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前期的美国容共政策目的不单纯是为了军事,也带有政治目的。依据有二:首先,在提出派遣“迪克西使团”的同时,戴维斯也主张在延安设立领事馆。在申述派遣军事观察组的理由中,他列出了华北地区与未来苏联进军的关系。无可否认,罗斯福同意派遣观察组不能说与此无关。其次,华莱士与蒋介石谈论容共问题主要是从协调中苏关系的角度讲的。华莱士指出“假如正如蒋主席所说中共与苏联有联系,那么更有必要把问题求得解决”,“任何足以造成中苏两国不睦的问题都不应悬而不决”。^②正因为容共始终是一种政治问题,而在政治上美国必须支持蒋介石,所以罗斯福很快就为那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而向蒋介石道歉。^③

①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509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3—575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第三册,第665页。

在出任驻华大使后, 赫尔利的首要任务是促成国共联合。1945年初, 国共谈判虽然陷入僵局, 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一政策。赫尔利积极参与国共重庆谈判和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都是有力的证明。中共对美政策也可作一侧面的证明。1945年9月中共中央的通知强调, “对美外交极宜谨慎, 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人民仍采合作政策”。^① 马歇尔也说, 中共对美不友好态度是在1946年3月底显示出来的。^② 1945年4月赫尔利的讲话不能解释为美国放弃了容共政策而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首先, 赫尔利声明的内容在他与中共交往的文件中早已提出过^③, 并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其次, 赫尔利使华的首要使命是防止蒋介石政府垮台。美国政界军界对中国国内局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军方“不相信蒋介石有以武力统一中国的能力”。^④ 政界人士认为国共冲突可能引起“国民党最终被推翻的危险”。^⑤ 无论从意识形态, 还是从美国在华利益的角度, 一个共产党政权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认为挽救蒋介石的有效办法就是把共产党容入国民政府, 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共联合政府。1945年初, 蒋介石政权的虚弱状况没有什么改变; 而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试想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怎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第三, “二战”期间, 苏联因素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一直存在。美国害怕国共两党的纷争把它卷入与苏联在远东的直接对抗。1945年, 一方面通过雅尔塔会议形成了美苏合作的格局, 另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第262页。

② 《马歇尔使华》, 中华书局1981年, 第462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 第600—601页。

④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第162页。

⑤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第608页。

一方面欧战结束在即,苏联在远东参战为期不远。这样的情况,美国怎能不予考虑?第四,美国驻华使馆及驻华美军与蒋介石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赫尔利使华负有避免蒋介石政权垮台和协调这一矛盾的双重任务。赫尔利认为这两个使命互有冲突,必须解决这一矛盾,“以为达到前述目标的先决条件”。^①因此,美国驻华使馆一些人员的调离不能被认为是赫尔利倾向于援蒋内战政策。

综合上述各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二战结束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促进苏蒋接近不能被看作是美国此时的一种对华政策。因为美国对华政策调节的是中美双边关系。美国促进国共接近不仅是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也是为了避免美苏因国共问题而在远东走向对抗。苏蒋关系的改善既是改善国共关系的目的,也是改善国共关系的条件。这是每次美国派特使赴华前都要探究苏联态度的根源。这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政策。

三

把抗战胜利前后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时间的上限段在1944年初罗斯福正式请求蒋介石允许向延安派军事观察员,下限定在1946年3月,比较合适。

就上限而言,有三个理由:第一,1943年10月《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表和同年12月的开罗会议及德黑兰会议,标志美国开始构建战后大国合作。通过近两年的接触,罗斯福认识到没有哪个国家会象中国那样“成为战后合作麻烦的根源”。^②德黑兰会议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04页。

②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61页。

上, 罗斯福与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的谈话, 及斯大林对与蒋介石会晤的拒绝, 使美国认识到“只要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苏联将继续对给国民政府提供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援助表示冷淡”。^① 为避免中国问题破坏战后大国合作, 美国需要调整对华政策。第二, 1943 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已丧失了人心, 在军事上败绩屡屡。国民政府已丧失了有效控制国家的能力。相反, 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1943 年, 中共不仅在军事上恢复和扩大了敌后根据地, 而且在政治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为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它需要调整对华政策。第三, 战后亚洲国际秩序以中美合作为基础, 这是美国的设想。国民政府实力的虚弱和政治上的腐败严重影响中国在战后亚洲发挥积极作用。为避免可能的不利结果, 美国需要加强国民政府的实力, 改良其政府。为此, 必须调整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截止于 1946 年 3 月。首先是因为 1946 年 3 月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标志着苏美冷战代替了苏美合作。美国苦心经营国共合作政策就是以苏美合作为前提的。苏美关系的变化必然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其次, 这也是由于远东国际问题所致。这个诱因主要是关于中国东北“敌产”的处理。1946 年 1 月, 苏蒋就东北“敌产”问题进行谈判。马歇尔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得知谈判的可能结果后, 致信美国国务院, 认为苏蒋关于东北“敌产”的处理将“严重地影响美国商业利益和整个门户开放政策”^②, 建议“对俄国人施加压力”。^③ 1946 年 2 月 9 日, 美国向中苏

① FR 1944, VI china!, Washington 1967, pp104

② FR 1946, VOL10,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1972, pp1100.

③ FR 1946, VOL10, The Far East: China, pp1102.

两国同时发出照会, 指责中苏两国的行动“都似乎是最不恰当的”。^① 此后不久, 苏军驱逐在东北的美国记者。美国舆论哗然。蒋介石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嗅出了味道, 内战之火被重新点燃。^② 马歇尔也承认, 蒋大打内战的“整个背景中也包括与苏美有关的国际形势”。^③ 第三, 1946 年 3 月以后美国的行动也表面, 它放弃了促进国共合作的政策。这些史实是: 1946 年 3 月 19 日,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成立; 马歇尔返华后执行双重调停标准, 加大运输国民党军队去东北、华北的力度, 调停成了帮助蒋介石完成内战部署的手段; 马歇尔重返中国致力于继续调停之时, 杜鲁门拟任命他为国务卿, 并为此派艾森豪威尔赴华劝驾; 1946 年 6 月 14 日, 美国违背 1945 年 12 月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中的规定, 提出“军事援华方案”。中共指出, 军事援华方案是美国“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④, 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政策”。^⑤

为进一步论证上述时间段, 有几个历史史实需作进一步说明, 即关于史迪威事件的性质和日本投降初期美国的在华活动。关于史迪威事件, 一般认为史迪威被解职表明, “美国在中国内部争夺中明显地站到国民党一方”。^⑥ 这种论断并不确切。史蒋矛盾的根源是美国两种对华军事战略所致。“二战”期间, 罗斯福设想的中国战场作用在于牵制日军。因此, 他关心的“并不是要催促蒋介石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 第 617 页。

②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 台北: 中央日报社 1977 年版, 第 497 页。

③ 《马歇尔使华》, 第 397 页。

④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 第 209 页。

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 第 224 页。

⑥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53 页。

石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而是只要中国继续战斗下去”。^①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军方赋予了中国战场另一种使命。史迪威在接到其赴华使命指令后,给马歇尔送交了一份关于战略问题的备忘录。他认为西南太平洋是防御地区,中国应是“最大进攻力量”。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观点。他向罗斯福总统强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必须提高,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军队的潜力”。这一点必须成为中缅印战区美国代表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②马歇尔、史迪威很欣赏中国士兵的战斗潜力,而对中军官的指挥能力评价很低。史迪威在缅甸战场初次受挫后,这种看法进一步发展。他赞成其部下多恩提出的由美国绝对控制中国军队的训练、指挥和部署的权力,而不必和重庆方面商量的主张。军队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史迪威的这种要求是他显然不能接受的。在蒋介石抱着获得更多租借物资的希望时,他还能容忍史迪威的一些行动。当通过史迪威获得更多的租借物资希望破灭后,蒋介石就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撤换史迪威的动议在柯里第二次访华之后就被提出来了。罗斯福在接受柯里建议时就认为,这是一个“人事问题”。^③因此,史迪威事件不能被解释为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作出取舍。1945年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也没有认为赫尔利的就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相反,中共明确肯定,当时赫尔利是促进国共团结的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执行者。赫尔利以后的所为恰恰是偏离了这一政策。^④

①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10页。

②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72页。

③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22页。

④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0页。

抗战胜利后,美军出兵华北和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被解释为美国援蒋内战的有力证据,尤其杜鲁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经常被用作证据。实际上,杜鲁门在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的同时也强调,美国要“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闯墙之争”。^①从国际法来讲,执行受降权是一国内部事务。美国政府的行动有其道理。对战后中国发生内战,美国是有预见的。美国一直认为,内战的诱因来自非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他们认为加强国民政府的实力有利于美国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的政策。对美国政府来说,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是加强国民政府实力的需要,也没有超出一定的限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挑起内战的恰恰是蒋介石。而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这又是同美国的援助分不开的。

美军出兵华北也应联系美苏在远东的矛盾来看。“二战”后期美苏合作关系建立的同时,两国间就龃龉不断。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召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在会议上激烈对抗,导致会议不欢而散。此后,苏联强烈不满美国独霸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拒绝与美合作。美国害怕苏联势力向长城以南扩张。为对抗和防范苏联,美军在华北登陆。费正清在回忆录中 also 说,美军在华北登陆是为了防范俄国人。^②美军在华北登陆确实有利于国民党,但这并不是要支持蒋介石与中共争夺东北。因为山东八路军赴东北主要从烟台渡海。1945年10月美军舰队到达烟台海面,要求登陆。在遭到中共军队拒绝后,美军放弃了登陆打算。这与后来美军伙同蒋军进攻解放区是完全不同的。1945年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72页。

②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83页。

11月,魏德迈拒绝了为蒋军进入东北提供进一步援助的要求。他向蒋介石指出:这种“行为是直接帮助中央军对抗共军的军事行动”。“根据目前给我的指令,我无权”提供这种帮助。^①

总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抗战后期美国确立扶蒋反共政策比较符合逻辑。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只是美国团结反苏力量的幌子。维护其国家利益才是它制定外交政策的唯一指针,否则就无法解释战争期间的苏美合作。一方面战时的合作使美国看到了让苏联就美国之范的可能,另一方面战后苏联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不可能不顾这样的事实立即在战后制造出这样的对手。美苏冷战是战后一段时间内双方外交政策互动的结果。因此,美国对华政策也并不以“二战”的结束而截然分开,期间有一个逐渐过渡的阶段。其根源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始终受其整体世界战略及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制约。“二战”结束前后美国的世界战略是大国合作,尤其是美苏合作。受这种战略的影响,加上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及远东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美国把促进国共合作,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作为主要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实施的时间是1944年春至1946年3月。这样的政策在客观上符合战后中国的民心,也是中共在战后初期能够接受美国调停的原因之一。但是美国制定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其自身利益,而不是顺应中国的民心。它在战后很快抛弃这一政策也是很自然的。因此,确认一段时间里美国执行了有利中国的对华政策并非与美国的扶蒋政策相矛盾。相反,它确实确实显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反映了历史的真面目。

(作者赵入坤,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309页。